

阿根廷的社会人类学

〔阿根廷〕 L. 巴托洛梅

从阿根廷一些大学建立最早的人类学专业迄今将近 25 年，这一学科的状况不太令人满意。一些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被撤销；有的徒有虚名，教学内容与人类学毫无关系；有相当一部分新毕业的学生在学业上缺乏训练；理论和思想体系存在着很大的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讲，1950 年美国人类学家 R. 比尔斯指出的拉美社会科学非制度化的特点仍适用于今天的人类学，尤其是至今仍有人坚持要否定它的科学性，把它划为我国通常理解的“人文科学”一类。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危机极为深刻，迫使我们实际上从零开始。这也包含着积极因素，如果精心耕耘，这一学科是能够巩固和发展的。

普通人类学是通过进化论和自由思想传进阿根廷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人类学继续发展的时候，阿根廷出现了一个“学术空白”。是奥地利历史文化学派的坚定促进者、意大利血统的人类学家因贝略尼填补了这一空白。因贝略尼及其追随者后来统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根廷人类学的发展，并控制着人类学在大学里的科学组织，巩固了在理论上的统治地位。战后，一批欧洲移民由于本土的气候不适宜于健康而来到阿根廷，这就更加强了因贝略尼一派的力量。奥地利史前学家 O. 门京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人种史博物馆，B. 马莱斯接替自由论者 E. 帕拉维西诺领导图库曼大学人类学学院，M. 德费迪南迪接替 C. 弗兰领导库约大学人类学学院。还有战后初期从意大利抵阿根廷的 M. 博尔米达。博尔米达起初是因贝略尼的追随者，后来是人类诠释学的现象学的鼓吹者，1948

年以后，他变成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人种学的“沙皇”，尽管政界和学术界都发生了变化，但他直到 1978 年逝世一直保持这一地位。

由于 1955 年的革命和庇隆政府的倒台，似乎与前政府牵连甚深的历史文化人类学家被赶出大学。大学里自由派复辟的结果是 1958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哲学系和拉普拉塔国立大学自然科学系和博物馆均设立了人类学专业。这两个专业虽然名称相同，但方向却相去甚远。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教学大纲注重文化和人种学，而拉普拉塔大学的大纲则显然强调考古学和博物学。

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人类学在教学中注重历史文化，但 1966 年以前，它一直是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发展。虽然只有一门课程讲授社会人类学，但是人类专业的学生可以在 G. 赫尔马尼组织的社会学专业学习。国外学成的人类学家来校任教有助于社会人类学的发展，他们提出应重新制订教学大纲，建立社会人类学专业。但是 1966 年由于翁加尼亚政府干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大部分教师纷纷辞职，因此上述努力刚刚开始就失败了。精通业务的教师辞职，接替他们的人采取机会主义和随机应变的态度，于是博尔米达的“诠释学的现象学”垄断了学术界，反理性主义开始抬头。

但是，在此期间并非一切都是消极的。1970 年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开设人类学专业。此后不久，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在内地的大学开始实现在母校遭到失败的计划。1971 年，E. 梅嫩德斯在当时的马德

普拉塔省立大学(现在的国立大学)开设人类学专业,在国内第一次根据当代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制订教学大纲。1974年,笔者在密西昂奈斯国立大学开设了专门讲授社会人类学的专业,第二年萨尔塔国立大学也开设了类似的专业。这两个专业授予人类学硕士学位。

从1973到1976年,大学生活和国内形势一样动荡不安。庇隆主义各派系把持的所谓“民族讲台”统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这些派系把他们的政治解说同带有很强的反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成分的、概念不清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这些政治概念和思想概念同人类学的现象学奇怪地混为一体。人类学就去寻找那种集绝对个性和普遍意义于一身的无处不在的最基本单位——“民族人”,或者是去发现根据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观念确定的“民众文化”的某些方面。除了个别例外,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极为可怜,教学水平明显下降,教条主义猖獗,常常出现掩饰无知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这一时期最坏的结果是,马德普拉塔大学和萨尔塔大学的社会人类学专业遭到了摧残,被指控为“唯科学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谓“唯科学主义”实际是课堂授课,学生学习,注重系统地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分析社会文化现象。在这些指控的背后是全国的社会科学教学工作被某些人有组织地把持了,其公开的目的是使社会科学为一种所谓的“民族事业”服务,不那么公开的目的是争夺职位。

1976年以后,新的教育当局继续打击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由于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对社会科学不加区别一概排斥,马德普拉塔大学、萨尔塔大学和罗萨里奥大学的人类学专业被迫撤销。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大学的人类学专业只是在变成研究生课程或合并到

其他学科后才得以保留到今天。密西昂奈斯大学由于地处边远,它的社会人类学专业才一直没有中断。

实际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人类学专业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具有人种学方向的历史学。拉普拉塔大学的人类学专业是一门带有人种学成分、并注重考古学的自然科学。这对于我国这一学科的未来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应该指出,尽管存在着阴暗面,但大学里人类学教学的危机并没有直接影响许多学生和刚毕业学生的态度和才干。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许多人到官方教育机构之外去寻找出路。例如自发地组织研究小组,协助一些人类学家中心为弥补官方教育不足而开办培训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E.埃米特从1974年起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人类学中心进行的卓越的教学工作和促进工作。该中心开办了多期培训班,推动了研究工作,从而成为真正的培养人类学家的“苗圃”。

还值得提出的是,人类学研究生院从1973年成立以来,一贯坚决捍卫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专业的地位。据估计,1959年以来,各国立大学毕业的人类学研究人员近600名,该研究生院接纳了其中的200多人。

关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工作首先必须强调它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对掌握决定我们社会的发展和活动大权的许多人来说,阿根廷是一片“未知的陆地”,由于它是十九世纪下半期大批欧洲移民构成的新的社会,根据从欧洲和美国社会推导的模式和概念不能理解它的现实,根据从拉美其他社会或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社会推导的模式和概念也不能理解它。政府官员以及许多政界领导人还远没有认识这一点。

阿根廷是一个多种文化混杂的“新的”社会,这个特点使人类学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我们虽然掌握较丰富的统计资料,进行了许多调查,却很少研究各种社会文化经济变量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讲阿根廷的文化价值,却没有研究哪些是文化价值以及它们是怎样结合为一体的,等等。

在我国,从社会人类学角度进行的调查研究是很不够的。我这样说不是不知道某些研究土著社团状况的成果的质量,也并非不知道某些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它们有时甚至超越了内容的局限。也不是想否认许多阿根廷人类学家从本文提倡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但是我要强调这些研究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协调性。阿根廷社会人类学的巩固取决于这类研究的正规化。

关于应用人类学的活动,我也有类似看法。最近几年,应用人类学的活动有明显的发展,这说明人类学家提供的知识特别有用。人类学家曾应召去为征服少数民族提供法律依据,分析对划分犯罪情况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他们不仅参与预测研究和规划,而且直接参与为在巴拉那河修建亚西莱纳大坝把两万多人迁移到波萨达斯城的行动。他们还在全国农牧业技术研究所以及有关规划、社会事务和住宅等国家级或省级机构和组织中发挥作用。人类学参与的另一领域是与身心健康有关的活动,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同医生、精神分析家和心理学家相配合,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虽然人类学家参与这些活动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他们只是在被允许接近计划或机构的特殊条件下进行活动。这就是说,人类学家只是作为个人被召集参加,而不是因为

他们的专业。

由于阿根廷人类学产生于上述历史条件,它的未来取决于克服它自己短暂经历中所遭到的歪曲和倒退。重建人类学不论是在教学方面还是在研究和应用方面,都与重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把人类学作为科学,人类学家成为社会科学家,并不意味着“唯科学主义”,也不意味着与社会现实隔绝,而是恰恰相反。如果知识“进口”进来,而我们却不积极参加研究分析以至解决我们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那我们将继续是产生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理论和观点的“进口商”。

首先应该修改目前还开设人类学专业的大学的教学大纲。当然并不能因此就放弃为重新建立被撤销的人类学专业而进行的斗争,但如果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和拉普拉塔大学现在的教学大纲那样很少包括人类学的内容,那么重开这些课也毫无意义。建立一个坚实的教学基础直接关系到巩固人类学家的科学地位和专业作用。学院培养人类学家应强调方法论的学习,并使他们将来能在跨学科领域发挥作用。

当然提出建议要比实现它们难得多,但是只要朝着一系列连贯的可能有效的目标努力,必有成效。在这方面,必须有国际人类学团体的帮助,它将使阿根廷人类学摆脱孤立的状态。要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交往,就研究题目和结论展开广泛的讨论,并进行积极的评论。

(余幼宁摘译自阿根廷《经济展》杂志 1982 年第 4 期)